



2022年11月13日

星期日
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管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办

文化周刊

CULTURE WEEKLY

衡阳日报
HENG YANG DAILY

今日四版 农历壬寅年十月二十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-0004 第18345号
衡阳日报社出版



舜帝，巡狩南岳的那些事（上）

■廖和平



舜帝像。（资料图）

“古者帝王莫不巡狩”。巡狩，是指天子出行，视察邦国州郡。古代文献中也被称为巡省、巡守等名称，是我国古代帝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

《孟子·告子·下》：“天子适诸侯，曰巡守；巡守者，巡所守”。意思是：天子巡行诸侯的国家叫巡狩，巡狩的人，是在巡行他的疆土。也是天子对诸侯治理能力的实地考察。

舜帝，根据《史记》的认定，以及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的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推定，舜大约生于公元前2173年，大约卒于公元前2073年。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，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奠基人，他开创了“尧天舜日”的美好



帝舜圖

女英

帝舜

娥皇

世道。因此，千百年来其行迹、业绩、思想、卒葬等问题，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

在南岳的各种传说故事中，舜帝巡狩的分量最重。舜帝位居“三皇五帝”之列，他的大驾光临，当然是南岳历史上的重大事件。

史书记载舜帝巡狩南岳

巡狩作为上古帝王的重要活动，在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孟子》《史记》等典籍中均有记载。

司马迁《史记》对舜帝巡狩的记载有两处：一为《五帝本纪》，一为《封禅书》。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曰：

於是帝尧老，命舜摄行天子之政，以观天命。舜乃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遂类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辩于群神。辑五瑞，择吉日，见四岳诸牧，班瑞。岁二月，东巡狩，至於岱宗，柴，望秩于山川。遂见东方君长，合时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，脩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赞。五月，南巡狩；八月，西巡守之礼。

狩；十一月，北巡狩；皆如初。归，至于祖祢庙，用特牛礼。五岁一巡狩，群后四朝。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曰：

尚书曰，舜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遂类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山川，遍群神。辑五瑞，择吉日，见四岳诸牧，还瑞。岁二月，东巡狩，至于岱宗。岱宗，泰山也。柴，望秩于山川。遂覲东后。东后者，诸侯也。合时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，修五礼，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赞。五月，巡狩至南岳。南岳，衡山也。八月，巡狩至西岳。西岳，华山也。十一月，巡狩至北岳。北岳，恒山也。皆如岱宗之礼。中岳，嵩高也。五载一巡狩。

在《礼记·王制》也记载了舜帝对南岳的祭祀：

“天子五年一巡守。岁二月，东巡守，至于岱宗。柴而望，祀山川。……五月南巡守，至于南岳，如东巡守之礼。八月西巡守，至于西岳，如南巡守之礼。十有一月北巡守，至于北岳，如西巡守之礼。”

上述三者都谈到了舜帝巡狩，巡狩的时间和次序分别是二月东巡狩、五月南巡狩、八月西巡狩、十一月北巡狩。

综上所述，南岳作为舜帝巡狩目的地是明确的，且秩序在岱宗后。先于《史记》的其他典籍对舜帝巡狩南岳的记载不少。如《尚书·虞书·尧典》云：

岁二月，东巡守，至于岱宗，柴。望秩于山川，肆觐东后。协时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。修五礼、五玉、三帛、二生、一死赞。如五器，卒乃复。五月南巡守，至于南岳，如岱礼。八月西巡守，至于西岳，如初。十有一月朔巡守，至于北岳，如西礼。归，格于艺祖，用特。五载一巡守，群后四朝。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，车服以庸。

这里对舜帝巡狩记载较为详细。这次巡狩之年的二月，舜到东方巡狩，到达泰山后燔柴祭天帝，并按照祀典秩序祭祀山川，然后接受各方诸侯的朝觐。又协调了四季的时令以及天数，统一了音律以及度、量、衡。又制定了五礼（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），还以五种瑞玉，三种不同颜色的帛，两种活物（活羊羔、活雁），一种死物（死雉）分别作为诸侯、卿、士的朝觐贡品，其中五种瑞玉在朝觐仪式结束以后还要还给诸侯。

舜，五月到达南岳衡山后举行与在泰山一样的仪式。八月到西方巡狩，到达西岳华山后也要举行与在泰山一样的仪式。十一月舜帝到北方巡狩，到达北岳恒山后，也举行同样的仪式。巡狩回来之后，到尧的大庙去祭祀，用一头牛作为祭品。每隔五年就要巡狩四方，四岳一次，诸侯在四岳朝觐。

《春秋说题辞》云：“尚者，上也。上世帝王之遗书也。”《尚书》跨越1600年时空，记录了从尧、舜、禹至秦的连续历史。从尧舜时代开始，出于治国安民的需要，统治者就将他们的谈话和政令，刻写在竹简和木片上，用于宣传和保存。《尚书》

就是这样一部官方文件的汇编。据相关史料推断，最早根据资料整编出《尚书》的，是生卒于公元前551年—公元前479年的孔子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《慎子·外篇》也记载：舜帝于二月中旬前往泰山巡狩，而后前往南方，五月到达南岳衡山，八月到达西岳华山，十一月到达北岳恒山。

这说明早在舜帝之前，衡山就已经被封“南岳”了。也就是说，其时，南岳是在国家政治版图中的。

“如岱宗之礼”是什么礼？

《书·舜典》云：“岁二月，东巡守，至于岱宗，柴。”南华大学教授张长元研究表明，舜帝巡狩南岳是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化的礼仪的，这就是“如岱宗之礼”。那么，“如岱宗之礼”的程序与含义又是什么呢？这就是“柴，望秩于山川”。

“柴”。是一个动词，就是烧一堆柴火，以告祭于天。不同典籍中，人们对“柴”的解释略有不同。《尚书》释“柴”为：“燔柴祭天告至”。马融认为其办法是“祭时积柴，加牲其上而燔之。”郑玄注《礼记·王制》也说：“柴，祭天告至也。”因之，孙希旦《礼记集解》除肯定“燔柴祭天”之说外，还进一步发挥“王者之事天，犹子之事父母，不敢读（渎），也不敢旷也。”加于“燔柴”上的牺牲有牛、羊、豕、犬和雉。

“望秩于山川”。秩为次序之意，所谓“望秩于山川”，即依次序望祭一方之名山大川。其次序是：天子祭祀全国的名山大川；诸侯祭祀所辖地的名山大川；全国的名山依东（泰山）、南（衡山）、西（华山）、北（恒山）、中（嵩山）为序。

为什么要“望秩于山川”？这与古人的山岳崇拜有关。《礼记·祭法》曰：“山林、川谷、丘陵能出云，为风雨，见怪物，皆曰神。”古人根据观察，认为云兴霞蔚的山林川谷便是风雨生成、万物滋长的地方，因而对其怀着敬畏的心情而加以祭祀，告慰神灵，祈求风调雨顺，获得四方之民的归顺与拥护。同时，也可显示其高踞于诸方之上的地位，以巩固其统治。

《礼记·曲礼》又言：“天子祭天地，祭四方，祭山川，祭五祀，岁遍。”郑玄注曰：“祭四方，谓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。句芒在东，祝融后土在南，蓐收在西，玄冥在北。《诗》云：‘来方禋祀。’方祀者，各祭其方之官而已。”

祭祀方岳的还有一个目的是“告天”，相信四方都有神祇存在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上古时期的政治观念、神鬼观念以及空间秩序观念是相统一的。

舜帝南巡目的是什么？

那么，舜帝多次南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笔者认为，除了祭祀天地之外，或许还有六个意图：

其一，是“巡狩方国”。无论文献典籍或民间传说，都有这一说法。舜帝“巡狩方国”本是一种定制，其深层意图是“考察官员，体察民情”。诸侯来到石鼓书院求学。

蔡汝楠不仅亲自参与书院管理和讲学，而且常与同僚一起会讲于石鼓，与学子们交流讨论，相互辩论。在明万历《石鼓志·卷之上》里，时任衡州通判李初记载其“志趣拳拳石鼓，与白石蔡公辩论经典，抽寻疑义，引诱诸生，多所启发。”并作诗《陪蔡白石公讲堂作》：

湘江岁月惜居诸，春暮追随拜孔庐。老我

自惭疏不得，多劳营道口传子。

蔡汝楠所教弟子王大韶也有诗纪念老师《石鼓讲堂怀蔡白石夫子》：

当年元定此登台，逐队青衿济济来。尽日春风吹讲幄，分更夜雨听鸣砑。

五经一解江河决，万众群蒙天地开。但看阶前双树绿，居人犹意向时栽。

明朝隆庆年间，衡州知府艾可久、通判罗贡和推官赵世卿也常结伴讲学于石鼓书院。每逢考试时不仅亲临监考，认真评阅，而且设置酒宴，以奖励优秀学子。清朝道光年间，衡州知府高人鉴对石鼓书院倾力培植，不仅亲临讲学，亲阅考卷，而且有过人的识人慧眼，赏识提拔了晚清“中兴四大名臣”之一的彭玉麟。

由于政府重视，名师荟萃，千百年来石鼓书院人才辈出。宋乾道八年，学子邓友龙、邓友麟、王居仁三人同中进士，成为一时的荣耀。明、清两朝，石鼓书院的学子中举登科者更是数不胜数。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八月，石鼓学子们赴省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，李孟彰、王大韶、谭汝康、徐应南、彭良臣、陶宾等六人同时中举，时称“朱陵六凤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“六凤”中的王大韶后来官至御史。他学识渊博，博古通今，曾主讲石鼓书院，参与编纂首部《石鼓书院志》，为后世

侯要向舜述职，舜借此考察他们的政绩，并据此赏罚。

其二，是“德服三苗”。《史记》所载：“天下明德，皆自虞舜始。”据《战国策·魏策》载：“昔者三苗之居，左彭蠡之波，右洞庭之水，汶山在其南，衡山在其北。”按现在行政区划，包括湖北、湖南、江西，以及安徽、浙江和江苏的一部分。但如今的长沙、衡阳、永州、岳阳和洞庭湖一带为三苗分布与活动的主要地区，是完全可以肯定的。《吕氏春秋·尚德》记载：三苗不服，禹讨攻之。舜曰：以德可也。行德三年，而三苗服。舜修政偃兵，执干戚而舞之，以德感化三苗，舜却三苗，更易其俗，使国家最后的疆域“方五千里，至于荒服，南抚交趾、北发”，从而实现天下大一统。

其三，是“会盟诸侯”。舜作为天子，处于中心而巡视四方诸侯和祭祀方岳，其巡视诸侯，制定礼制法则也是为了督促各路诸侯有效治理方国。舜帝来到南岳衡山，大会南方诸侯，筑坛祭祀山川，并将玛瑙瓮专盛的甘露赐给众人，此坛因而命名为甘露坛。舜帝还多次于此召开诸侯大会，问计天下。

其四，是“助禹治水”。据传，舜帝61岁登临帝位；93岁时，交由大禹摄政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认为，舜是为视察洪涝灾害而南巡。南方多水患、多猛兽、多灾荒。舜决心亲自到南方巡视，寻找解决之道。舜命禹制定了“分导其流而分其量，疏浚河身，以安其流”的治水方案，又委派身边大臣皋陶、伯益等助禹实施治水工作。舜还颁号令，从九州到四海，每州征集3万人，共计28万余人，由各州长分管带队服从禹的调遣。

其五，是“崇祀炎帝”。《南岳总胜集》云：“（舜）致斋南宮，以祀炎帝”。《左传·成公》也记载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先于舜帝大致200多年的炎帝，其陵寝之地在衡山以北的“长沙茶乡之尾”，舜帝是清楚的，更是恭敬的。

其六，是“看望亲人”。当初，舜帝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封于有庾（今永州道县），将其儿子南均、叔均等封于长沙，巴陵（今岳阳）。舜帝南巡，则“公私兼顾”，有看望亲人的成分在里面。经舜教化后的象在有庾做了不少好事，深受爱戴，死后当地人立有象祠。最后，舜帝逝于弟弟象的封地，且安葬在了那里。

舜去世后，其随征的宗族、族人有不少滞留南方，成为最早徙居湖南的一批中原华夏族人。

关于舜帝南巡的路线，学界普遍认为：从蒲坂出发，过黄河，渡淮河，汉江南行，过长江，到洞庭湖，沿湘江南下，经南岳衡山到永州，再从永州溯潇水而上，南行至零陵，后从零陵到各地去巡视。

舜帝在南巡时，与商均、姚领等随从和乐工，顺湘江、溯潇水而上，一路上传道、教稼穡、授陶艺。这些充分说明，舜帝开发和统一南方，事实上早于秦始皇，汉武帝开发和统一南方的时间，起码有千年以上的历史。

这意味着，我国南北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历史篇章，远在舜帝时期就揭开了。

风雅石鼓

石鼓书院开创“讲学式”教育新模式

■刘 洁



湛若水像。（资料图片）

与王阳明是同时代人，长阳明先生七岁。湛若水与王阳明白公元1504年相见，就成一世的知己，后来虽在学术上有争议，但仍保持着深厚的友谊。两人都是既为官又为学，以王阳明的话来说是“共以倡明圣学为事”。湛若水从44岁时开始讲学，一直到去世，历时50余年。曾在南岳建甘泉书院，也曾数次应邀到石鼓书院讲学。

湛若水大概是来石鼓书院讲学名家里年纪最大的。《清泉县志·人物卷》里记载他：“九十复游衡州，舟泊石鼓，题诗讲堂壁间，再登南岳，栖迟数月。庞眉皓首，颜若童稚，望之若仙人焉。”90岁的湛若水自己作《承应谨庵督学置酒请会于石鼓书院作》曰：

衡云烂睡六十日，江雨痛饮蒸湘头。含情吊古忘言说，石鼓无声江自流。

王阳明虽然没有来到石鼓书院，但他的高足邹守益却是对石鼓书院有过很重要的影响。邹守益（1491—1566年），字谦之，号东廓。探花及第，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。因直谏被打屁股罢了官，于是居乡讲学，从者甚众。他一生讲学简易明了，朴实无华，直指人心，是阳明先生最器重的弟子之一，也是阳明先生《年谱》编修总裁。因教导有方，祖孙四代中出了7个进士，5个举人。嘉靖年间，邹守益来到石鼓书院，登临合江亭，不由细思曾来过的先辈，步韩愈《合江亭》之韵作《步石鼓书院壁间文公韵》：“后来予韩子，古调亦寡和。”这里有韩愈来过。“南渡得朱张，绝学最上课。”朱熹和张栻也曾来此地讲学。咏古叹今，于是决定留下讲学。他将与石鼓学子们讨论的内容整理成《语石鼓诸生二十五篇》，对识性、求实、习习、笃行、慎独、戒惧、格物、致良知等作了精辟的阐述，成为石鼓学子们向学的至理名言。

明朝初年全国书院转衰，直到阳明心学兴起书院再度兴盛。而石鼓书院由于代表“甘泉学派”的湛若水以及代表“阳明心学”的邹守益的多次到来，成为“王湛之学”的重要传播平台。时任衡州知府的蔡汝楠曾说：“考亭（朱熹）、南轩（张栻）与今湛、邹二先生所尝过化”是造就“石鼓著名穹壤”的重要原因。将湛若水、邹守益与朱熹、张栻相提并论，足见其二人对石鼓书院影响之大。

除了前后石鼓七贤之外，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大儒来到石鼓书院讲学。如宋代的汪澈、戴溪、程洵；元代的黄晦斋、程敬直；明代的叶丰川、茅坤、蔡汝楠等；清代的吴时来，旷敏本、余廷灿、张学尹、王闿运、曾熙等，都相继来这里或登台传经或主持书院或偕同会讲。可以说，自宋以来，众多一流学术大师在石鼓书院交相辉映，名家荟萃。

石鼓书院另一特别之处，是地方官员的高度重视。石鼓书院从南宋以来并非官学，但地方官员来衡阳赴任，或是上级官员来衡阳视察，多首先到石鼓书院。历届地方政府对石鼓书院的重视和支持都超过衡州州学。历史上多位担任过衡阳第一长官的官员都亲自担任石鼓书院的老师，教育学生，为石鼓书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这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嘉靖年间在衡阳任知府的蔡汝楠。

蔡汝楠（1514—1565年）字子木，号白石，进士出身，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年）出任衡州知府。在衡阳任职四年间，他不仅亲自为石鼓书院订立条约，建立奖惩制度，而且每月的初一和十五，必登台讲学。平时只要有空闲时间，就来书院与学子们讨论经书，命题考试，回答质疑。由于管理有序，讲学有方，学习之风日浓，石鼓书院声名远播，大量优秀学



邹守益像。（资料图片）

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书院史料。清光绪六年，石鼓书院学子祝松云、谭鑫振、杨依斗、陈鼎4人登科，其中谭鑫振殿试点了探花，一甲第三名。石鼓学子入仕人数也灿若群星，其中前面提到的彭玉麟为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，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至今为世人称道。

除了地方官员重视石鼓书院教育之外，1200多年来的著名儒家思想家多多少少也与石鼓书院有些联系，可以说石鼓书院见证了儒家千年来的发展历程。由于自宋代以来的儒家各大思想流派都曾来到过石鼓书院，思想交流碰撞，学术氛围深厚，石鼓书院成为远至京师近至衡永郴桂士人们向往和云集的学府，成为湖湘地区引入瞩目的儒学传播基地，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“讲学式”书院的楷模，对湖湘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石鼓书院开创了自由讲学、互相讨论、求同存异的古代书院“讲学式”教育新模式，这在当时是一大创新精神的体现。这种“讲学式”的教学模式也为儒家理学的未来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，对后世学术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，也使得提倡自由辩论、思想碰撞的书院日益兴盛。